



需

学西传欧洲 研究导论

张西平 著

在全球化的今天，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尤其是在中国日益融于世界的今天，回顾中西初识的历程，并梳理这段历史，将会使我们从中获得更多的智慧，启迪当下，乃至未来。

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
轨迹与影响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张西平 著

儒学西传欧洲 研究导论

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
轨迹与影响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 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张西平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301-27189-6

I. ①儒… II. ①张… III. ①儒家—思想史—研究—欧洲—16—18 世纪
IV. ① B222.05 ② B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5611 号

- | | |
|-------|---|
| 书 名 | 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
Ruxue Xichuan Ouzhou Yanjiu Daolun |
| 著作责任者 | 张西平 著 |
| 责任编辑 | 张 冰 朱房煦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7189-6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zhufangxu@yeah.net.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382 |
| 印 刷 者 |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9.5 印张 320 千字 |
|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58.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前言

开拓儒学早期西传欧洲研究的新领域

—

梁启超在谈到中国历史的研究时说过,根据中国历史的发展,研究中国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所谓“中国之中国”的研究阶段,是指中国的先秦史,自黄帝时代直至秦统一,这是“中国民族自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所谓“亚洲之中国”的研究阶段,是为中世史,从秦统一后至清朝乾隆末年,这是中华民族与亚洲各民族相互交流并不断融合的时代;所谓“世界之中国”的研究阶段,是为近世史,从乾隆末年至梁公当时,这是中华民族与亚洲其他各民族和西方民族交流,并产生激烈竞争之时代。从此,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之一部分。

实际上,梁启超所提出的历时性划分,是为了说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直存在的。尽管中国的边疆地理有一定的封闭性,但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封闭的,它与世界的联系,也并

非是从乾隆时期才开始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梁公就提出过两个当时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第一,“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第二,“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他试图通过对这两个在常人看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事实,来说明中国史从来不是在封闭的圈子里发生和展开的,世界各国的历史是相互关联的。因而,他的真正目的在于说明:要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中加以考察。

梁启超如此立论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有两个目的:其一,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史表示不满。因为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史中,没有看到中国对人类史的贡献。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说道:“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日本、俄罗斯之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罗斯皆摈不录)亦无异议焉。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显然,他对“西方中心论”十分不满。其二,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看待中国文化的地位和贡献。他指出中国史主要应“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人类所应负之责任”。^①虽然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但他认为:“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②

二

自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后,诸多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20世纪80年代,著名世界史学者吴于廑明确提出建立全球世界史的理论,北京大学罗荣渠的现代化历史研究也将世界史和中国史的研究置于一个历史的进程中。特别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进步,极大丰富了我们关于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关系的认识。但从世界的角度,认真梳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和影响,并以此来审视中华文化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特别是对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精神文化如何传播到西方,对西方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②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

世界产生何种影响,前辈虽有所研究,但仍有极大的空间有待我们去努力。其最重要的阶段,就是明清之际的“中学西传”研究。

在全球化的今天,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尤其是在中国日益融于世界的今天,回顾中西初识的历程,并梳理这段历史,将会使我们从中获得更多的智慧,启迪当下,乃至未来。

对中国学者而言,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最缺乏“中学西传”的研究。首先,这里有文献搜集和解读的困难,对研究者有较高的语言能力要求;其次,“中学西传”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进入欧洲思想史的研究。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的《神奇的土地:利玛窦的适应政策与西方汉学的兴起》是奠基之作。而中国,虽然有金国平先生这样的大家,且学术界在翻译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显不足。^①

① 中国学者的译著,主要有以下几种:[意]利玛窦、[法]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尊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商务印书馆,1975年;[西]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何高济、吴翊楣译,中华书局,2008年;[西]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13年;[葡]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葡]安文思:《中国新史》,何高济、李申译,大象出版社,2006年;[比]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赵殿红译,大象出版社,2007年;[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法]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信集——中国回忆录》,朱静、郑德弟译,大象出版社,2001年;[法]李明:《中国近事报道》,郭强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美]魏若望:《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吴莉苇译,大象出版社,2006年;[美]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余三乐、石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澳门《文化杂志》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大象出版社,2003年;[法]艾田蒲:《欧洲之中国》,许钧、钱林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捷]严嘉乐:《中国来信》,丛林译,大象出版社,2002年;[德]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杨保筠译,大象出版社,2005年;[美]孟德卫:《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潘琳译,大象出版社,2009年;[德]柯兰霓:《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李岩译,大象出版社,2009年。中国学者已出版的相关研究著作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人民出版社,2003年;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吴莉苇:《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吴莉苇、张国刚:《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严建强:《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华书局,2004年;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等等。

三

本书就是在孟德卫之研究著作的启发之下展开研究而成。然而阅遍该书,孟德卫先生对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几乎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的起点是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我经过长年的研究,认为罗明坚才是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西传的第一位开拓者。因此在本书中,我对罗明坚在儒家著作西传的贡献,特别是他的《四书》翻译,做了初步的梳理,这是在中国学术界的首次披露。利玛窦对儒家思想亦有贡献,因多有研究,本书不再单独展开。

孟德卫先生在他的书中对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等来华耶稣会士的重要代表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子》做了深入的分析。我在他的基础上,对这本书的形成、结构和翻译内容,特别是在哲学思想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此外,由于孟德卫先生已经对来华耶稣会士安文思、曾德昭等人的几部汉学著作做了深入的研究,在本书中我将不再对这些著作进行讨论,而是从整体上对来华耶稣会士的中国典籍翻译做一个初步的总结,并特别梳理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的中国典籍翻译。

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本书则努力用全球史的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并立足今天的中国,对启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一番思考。最后,本书对16—18世纪的中学西传进行了总结,对耶稣会中学西传事业的翻译数量和时段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和划分,也对16—18世纪中学西传研究滞后的原因作了分析。

此外,本书也对研究的方法论进行创新,保持研究中的理论和文化的自觉性。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因而比较文化成为展开研究的基本方法。目前在学界,后殖民主义的方法是一种比较通行的方法。但我对于这样的一种方法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至少从我目前的阅读来看,这些舶来理论都有着相当的漏洞。尽管其中有些观点也可以吸取,但总的来说无法很好地说明中华文化在世界传播和影响的历史。我们不能认为,西方汉学对中国有着想象的成分和内容,就可以说它和中国无关;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都是异国的想象;无论是把东方想象成天堂,抑或是地狱,这些都是西方人将东方作为自己的他者而对自身

的认识,它和真实的东方没有任何关系;西方东方学的知识没有真假之分,无所谓对错;西方汉学只是西方人自己的“单相思”。凡此种种都缺乏对西方汉学史系统的研究,而仅仅是“东方学”思想的简单移植。

本书对方法论的强调,是为了说明,在研究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过程中,理论框架和分析的依据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就只是一堆史料,而全部的研究也就失去了灵魂。而我深深感到,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极少有研究能够真正立足本土、吸收外来理论来展开理论创造,仍待努力。确实,西方理论界有值得学习之处,但如何学习,以及如何吸收,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些眼花缭乱的西方理论使我们有些疲于理论的介绍,或许回到本土,才能消化好这些“洋货”。这正是:“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望尽乡。”

四

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是两大重要的文明。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两大文明的相遇、相识经历了跌宕起伏、曲折复杂的过程。西方在认识东方、认识中国的历史过程中,也经历了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的不同的认识阶段。西方汉学作为西方理解中国精神和文化的核心学科,经历了从“游记汉学”到“传教士汉学”再到“专业汉学”的漫长阶段。另一方面,只有中国古代的典籍被陆续翻译到欧洲之后,中国文化才在西方产生精神性的影响。因此,探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的传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以及西方汉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与传播,在西方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它始于明清之际入华的传教士,他们充当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翻译和传播的主体。通过他们的辛勤耕耘,中华文明的智慧之光第一次以文本的形式展现在欧洲人面前,并对欧洲的文化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影响。第二个阶段则是在19世纪。这是西方人的世纪,尽管西方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和介绍从未停止,但中国古代文化成为西方精英们所想象的思想的“乌托邦”,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它只是被作为一个博物馆的文明来欣赏的,现实的中国已经败落了。最后一个阶段则开始于20世纪,中国学人和欧美汉学家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的两大力量。特别是在20

世纪下半叶,新中国开始探索独立翻译文化经典、向西方传播的道路,从而使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呈现出多彩的局面。

儒学在欧洲早期的传播,是整个“中学西传”历史的根源,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它也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精神交往过程。我希望这本小书能将儒学早期西传的研究有一个小小的推进,成为今后学者研究的铺路石。

目 录

前 言 开拓儒学早期西传欧洲研究的新领域	1
导 语	1
第一章 罗明坚: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西传的开拓者	7
一、首次将儒家经典《大学》的部分内容翻译成拉丁文	11
二、绘制了欧洲的第一份中国地图	22
三、第一本介绍中国及在中国传教的拉丁文著作	33
四、第一次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	43
五、罗明坚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59
第二章 来华耶稣会: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西传的桥梁	63
一、“礼仪之争”前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	65
二、“礼仪之争”中在华耶稣会会士对中国典籍的翻译	68
三、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典籍翻译的一个初步小结	103
第三章 《中国哲学家孔子》:18 世纪欧洲的中国哲学名著	121
一、《中国哲学家孔子》简介	121
二、《中国哲学家孔子》与礼仪之争	123
三、《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跨文化特点	126
四、《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世界文化史意义	130

五、《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基本内容	131
六、书中译文的分析:摇摆于欧洲与中国之间	133
七、对中国知识认识的推进	145
第四章 16—18 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对欧洲的影响	149
一、全球史观下新的思考	149
二、18 世纪欧洲的中国热	151
三、中国思想的价值	156
四、启蒙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162
第五章 一个初步的研究总结	165
一、耶稣会中学西传事业的翻译数量和时段划分	165
二、16—18 世纪中学西传的一个小结	190
三、16—18 世纪中学西传研究滞后的原因	192
结 语	195
附 录	197
一、《入华耶稣会年报告档案文献目录》中传教士 关于“礼仪之争”之记载的目录	197
二、欧洲最早的儒家经典翻译	211
三、波塞维诺《图书选编》(1593)中的中国	223
四、罗明坚在《图书选编:有关历史、学科、 救世的学习方法》中有关中国的记载	234
五、《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中庸》译文择录	250
六、卫方济《中国六经》法语转译本前言	263
书 目	275
索 引	289
跋	299

导 语

今天的世界俨然是一个地球村,各个民族和国家作为成员参与世界的活动,从而构成一个整体。这一切都源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①

迄17世纪末叶,文明人类已航行了合恩角、好望角、东南角(澳洲塔斯马尼亚岛)、西南角(大洋洲新西兰南岛)以北的全部海洋,遍及地球表面海域的9/10;并且解决了大地的形状、大小、地球上水域包围陆地还是陆地包围水域、海洋是否相同等问题;基本上清楚了地球表面海陆接触相交的大部分情况,即地球上9/10的大陆海岸线和大岛海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美洲和环绕非洲的航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67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98页)当代全球化史的研究者也认为:“我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即根据实际上是西方史的世界史来论述现代时期起因。我们所养成的这种习惯只不过是受到了都市商业文明——其覆盖面在蒙古人入侵前从地中海沿岸地区一直到中国海——发达的影响。西方继承了这一文明的部分遗产,在其影响下才得以成就自己的发展。这一文明的传播受惠于12、13世纪十字军的几次东征和13、14世纪蒙古帝国的扩张……西方的这种落后状况一点也不奇怪,意大利的城市……地处亚洲大型商业之路的终端……西方只是由于海上的扩张才得以摆脱隔离状态;它的兴起正好发生在亚洲两大文明(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面临威胁之时。”参阅[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英]巴里·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岸线的走向和长度……在这 250 年中文明人类到达和认识的地区、地理大发现的成就大于 5000 年来地理发现成就的总和,也大于此后 250 年的地理发现成就。因此,这个时段的地理发现称之为地理大发现。所以人类历史和世界地理上的地理大发现只有一个,它从 15 世纪下半叶持续到 17 世纪末叶。^①

地理大发现的最早推动者是地处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恩里克王子(Infante D. Henrique, 1394—1460)的带领下,葡萄牙“将地理探险和发现成为一门艺术和科学,使远航成为全国感兴趣、与之有密切利益联系的事业”^②。葡萄牙人首先攻下北非的休达,然后乘着三桅帆船小心地沿着西非海岸前进。1488 年迪亚士(Bartholomeu Dias, 约 1450—1500)发现了好望角;1498 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 约 1460—1524)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沿东非海岸,过红海口,直达印度大陆。葡萄牙开辟了西方到达东方的新航线。1511 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进而占据暹罗和巴达维作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据点。1517 年,葡萄牙人在船长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ires de Andrade)和使臣托梅·皮尔资(Tomé Pires)的率领下从马六甲来到中国。这是中国与西方人的首次相遇。^③ 广东巡抚林富奏疏言:

正德十二年(即 1517 年),有佛郎机夷人,突入东莞县界,时布政使吴廷举须其朝贡,为之奏闻。此不考成宪之过也。^④

1492 年 8 月 3 日,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 1451—1506)带领探险船队从港口帕洛斯出发,1493 年返回,其间发现了北美新大陆。1522 年,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的西班牙船队首次环球航

① 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15—17 世纪》,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32 页。

② 同上书,第 81 页。

③ “1500 至 1700 年间,葡萄牙人试图在从好望角的开普敦到日本之间建立一个贸易和权力网络的世界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它随时都在两个层次:制度和功能上发生变化。有些变化微妙得几乎不易觉察,有些变化则清晰可见。因此,要理解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所要适应的环境和所使用的途径,我们不仅仅需要描述他们在上面表演的‘亚洲舞台’,还需要考虑这 200 年中亚洲历史的活力。”参阅[印]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 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何吉贤译,朗曼书屋,1993 年;[葡]雅依梅·科尔特桑:《葡萄牙的发现》,邓兰珍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年。

④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三),昆山市顾炎武研究会点校,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 年。

海成功,开辟了从欧洲到达亚洲的另一条不同于葡萄牙人所开辟的新航线。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从美洲到达菲律宾,开始与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交往通商,形成了“中国—阿卡普尔(墨西哥西海岸)黄金水道”,“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由此拉开序幕。^①

“寻找契丹是百年航海史的灵魂。”从柏朗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1180—1252)到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这些中世纪旅游者的游记一直点燃着西方寻找富饶契丹的梦想。东方刺桐港堆积如山的香料和契丹大汗无与伦比的财富,成为枯燥无味的中世纪欧洲人的热门话题。哥伦布出发时,带着一份西班牙国王致大汗的国书,葡萄牙人则将寻找“秦人”作为他们前往东方的重要使命。^② 奥斯曼帝国兴起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陆上商路被阻断,所以,寻找香料、与东方重新展开贸易,成为欧洲海上扩张的根本目的,而基督教的扩张则将其文化梦想、商业利益和宗教扩张融为一体。

16 世纪的基督教已经从个人的隐居生活中解放出来:

以往的宗教团体隐居在禅房、修道院和围墙内,这反映了它们诞生时的私人经济。圣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Igreja de São Francisco de Assis)创建的方济各会是说教者、传教士和云游僧侣的组织。他们提出要走出修道院,把基督的话和榜样带给民众和异教徒。这符合都市和贸易新体制,符合资产阶级的扩张野心和文艺复兴前期人民要求平等的愿望。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从十字架上走下

① Luís Adão da Fonseca, *The Discove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Ocean: 14th Century—16th Century*, Lisboa: Comissão nacional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9.

② 葡萄牙国王曾颁布寻找“秦人”的敕令:“你必须探明有关秦人的情况,探明来自何方?路途有多远?探明何时到达满刺加或探明进行贸易的其他地方?探明带来什么商品?探明每年驶进多少艘船?探明船只的形式和大小如何?探明是否在来的当年就回国?探明在满刺加或其地方任何国家是否设有商栈?探明是富商吗?探明生性懦弱还是尚勇好战?探明有无武器或火炮?探明穿什么样的服装?探明身材是否高大?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大吗?他们是否不止一个国王?他们国中是否有与他们法律信仰不同的摩尔人(穆斯林)或其他民族?如果他们不是基督徒,那么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他们遵从什么样的社会习俗?他们的国土扩展到何处?与哪些国家为邻?”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钱江译,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第36页。

来,走向全世界,与穷人结合在一起。地球变成广阔而灿烂……^①

在欧洲的各个天主教修会中,耶稣会成为走向东方的先驱之一。中国是其众多东方目标中的一个。

在200年时间里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共计456人。他们大多数成为御用数学家、地理学家、画家和园林设计家,照顾了151个堂区,出版了成百上千部中文著作。来华耶稣会士为传播欧洲科学和文化以及东学西渐,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向欧洲输送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并带回了中国的工艺品,这对欧洲的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热。^②

地理大发现所开启的全球化,并非仅仅使人类在地理上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认识了自己生存的家园——地球,也开始了人口的流动、贸易的沟通、科学技术的交流、农作物的传播,乃至疾病的传染。^③在西方殖民主义的血与火中,世界从孤立与分散走向联合与统一,不同文化也开始相遇,并发生碰撞。直至今日,这种文化的接触和碰撞、理解与纷争仍在继续。

在16世纪后西方文化充满血腥的初期全球扩张中,唯一的例外,则是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接触。在这200年间,两者之间相识、交融,开出了绚烂的文明花朵,成为这一时期人类在文化上的最大的收获、最宝贵的成果和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探求其原因主要在于,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中国与欧洲都不相上下,甚至要高于欧洲。远来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无法采取他们在非洲和美洲所采取的殖民政策,只能以另一种

① [葡]雅依梅·科尔特桑:《葡萄牙的发现》(第一卷),邓兰珍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第96页。参阅[荷]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对十四和十五世纪法兰西、尼德兰的生活方式、思想及艺术的研究》,刘军、舒炜、吕滇雯、俞国强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德]毕尔麦尔等编著:《中世纪教会史》,雷立柏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

② [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谷裕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52—53页;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Leiden, Boston, Koln, Brill, 2001.

③ 张箭在其地理大发现研究中,主要从地理、科学的角度讨论了地理大发现的重大作用和影响。他也谈到了地理大发现对社会科学发展的贡献,但主要围绕西方社会的角度而展开。其实,地理大发现在文化上的主要价值是文化的相遇与碰撞,它所带来的文化冲突,西方殖民主义在全球化中对待异族文化的野蛮态度的影响,至今仍未解决。经济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相遇和理解,求同与存异,至今仍是地理大发现以来一直未很好解决的问题。

形式与中国接触。^①而来自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也在中国采取了一种和平的文化适应政策,为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和理解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

18世纪耶稣会在华传教的历史与欧洲对中国的早期研究,或者称为早期汉学,是不可分割的。虽然传教这一首要任务将耶稣会士和早期汉学家区别开来,但耶稣会士作为有关中国地理、语言、政治、哲学、历史和社会生活情况的主要传播者和解释者,为那些后来成为早期汉学家的欧洲学者提供了学术基础。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经常利用返回欧洲逗留的机会或通过从中国寄回欧洲的书信与这些学者保持直接的、密切的联系。^②

来华耶稣会士沟通中国和欧洲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他们第一次用欧洲的语言翻译中国的古代文化经典。由此,传教士汉学和那种道听途说的游记汉学才有了根本性的区别。“游记汉学”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这些作者叙述的是个人的经历,他们很少亲自研读中国的典籍文献,自然也谈不上从事中国典籍的翻译工作。这些来到东方的“游客们”,游走四方,浪迹天涯。尽管他们也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信息,也给西方讲述了不少动人心弦的故事,但总体上他们提供给西方读者的中国是一幅多样的、感性的中国,是一种个性化的讲述。在此时期,由于西方人无法获得中国典籍,他们只能获得一个关于中国的感性印象,一个神奇、支离破碎、可以任意想象的中国。因此,无论是西方大众还是知识界,他

① 西班牙传教士桑切斯在菲律宾制定了一个攻打中国的计划,葡萄牙初到中国南海与明军的交战都以失败而告终。参阅张维华:《明史佛朗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台湾学生书局,1972年;张铨:《中国和西班牙文化关系史》,大象出版社,2003年;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基金会,2000年;金国平、吴志良:《过十字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4年;罗荣渠:《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美]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周叶谦、刘慈忠、吴兰芳、刘方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陈怡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2—3页。[美]唐纳德·F.拉赫:《发现的世纪》,周云龙译,《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周宁总校,人民出版社,2013年。[葡]巴洛格、[西]艾斯加兰蒂等:《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13年。

们都无法从精神层面上把握和认识中国。^① 自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分别统治欧亚大陆的两端起,欧洲与中国就开始沿着丝绸之路往来贸易。但直到大航海时代后,以耶稣会士入华为标志,中国和欧洲才真正开始了思想文化意义上的交流。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所包含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意义,才第一次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时彰显出来。

^① 参阅[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1年;[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美]柔克义译注:《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耿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02年;[英]约翰·曼德维尔:《曼德维尔游记》,郭泽民、葛桂录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